

论东亚经济“V 型反弹式复苏”的动因

林 震

(武汉大学 历史学院 湖北 武汉 430072)

摘 要 :1997 年东亚金融危机直接起因于金融恐慌和东亚金融监管机制的脆弱。与拉美地区在 20 世纪 80 年代危机后所经历的“U 型渐进式复苏”截然不同,在东亚地区,外部动力、技术动力、实体经济动力和政策动力这 4 种动力构成了独特的“东亚活力”,推动东亚经济实现了独特的“V 型反弹式复苏”,使东亚很快从危机的阴影中走出来。

关键词 :V 型反弹式复苏;动力;东亚活力

中图分类号 :F114.46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671-4970(2009)02-0055-04

1997 年 8 月,泰国政府在耗尽国家外汇储备之后,无奈宣布放弃捍卫本币的努力,泰铢迅速贬值,并演化成一场严重的金融危机。随后,危机迅速蔓延到印度尼西亚、马来西亚、韩国、菲律宾等国家,形成一场遍及东亚^①的金融危机。人们预言东亚经济从此将陷入滞胀,然而,东亚并没有重蹈 20 世纪 80 年代拉美地区的覆辙,而是走了一条独特的“V 型反弹式复苏”的道路,此后东亚继续保持强劲的发展势头:1998~2005 年,东亚新兴经济体(不包含日本)的年均增长率超过 9%^[1]。

针对东亚这种独特的经济发展现象,国内外已有大量的研究文献,其中以世界银行的系列研究报告最为全面和权威^②。在这些已有研究成果的基础上,本文拟从多层面探寻东亚“反弹式复苏”的深层动因,归纳出潜藏在东亚社会内部的“东亚活力”。

一、关于危机成因的不同解释

关于这场危机的成因,许多事后的评估认为,危机是“东亚奇迹”内部潜伏问题的总爆发^[2-3]。这种观点的正确性无可指责,但还不足以解释危机的成因。本文主要介绍 3 种颇有特色的解释:克鲁格曼的“汗水论”,伊藤隆敏的“脆弱论”,斯蒂格利茨和约翰逊的“危机外来论”。

“汗水论”的首创者是美国经济学家、2008 年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保罗·克鲁格曼。1994 年,他在

美国《外交季刊》发表文章,分析潜伏在“东亚奇迹”内部的问题^[4]。克鲁格曼以新加坡为例分析东亚的经济增长模式:新加坡在 1966~1990 年,年均经济增长率 8.5%,人均收入以 6.6% 的速度增长(每十年翻一番),这确实是一个奇迹,但这些成就是靠劳动力和资本投入拉动的,劳动生产率并没有得到提高,形象地说,新加坡的经济增长“是基于汗水而不是灵感”。就业人口占全部人口比例从 27% 上升到 51%,劳动力水平从一半多雇佣人口没有受过教育到 2/3 雇佣人口完成了中等教育,投资占产出的比例从 11% 上升到 40%。克鲁格曼还分析了日本的情况,发现即使是已经跻身发达国家的日本,它的经济增长也更多的是建立在劳动力和资本的投入上。按照克鲁格曼的观点,东亚是依靠物质资本和人力资本投入(即“汗水变量”)的增加来驱动经济增长的,技术投入造成的劳动生产率提高对经济增长的贡献几乎可以忽略不计,因此,受到报酬递减规律的制约,东亚地区不可能长期保持较高的经济增长速度,亚洲地区将成为世界经济中心的观点是缺乏依据的。

在“汗水论”的基础上,克鲁格曼继续深入对东亚的研究。1996 年,克鲁格曼在《流行帝国主义》一书中大胆预言亚洲将出现金融危机。一年后不幸言中。

值得关注的是,克鲁格曼对危机成因的观点随着危机的发展和他对危机观察的深入也在不断发

收稿日期 2008-11-27

作者简介 林震(1971—),男,福建莆田人,莆田学院副教授,武汉大学博士后,博士,从事东亚政治现代化、台湾问题研究。

① 此处的东亚是一个经济地理概念,包括:日本、新加坡、韩国、中国台湾、中国香港、马来西亚、泰国、印度尼西亚、中国和越南。

② 世界银行系列研究报告包括《东亚奇迹》(1993)、《东亚的教训》(1997)、《东亚奇迹反思》(2001)、《东亚复兴——关于经济增长的观点》(2007)、《东亚具有竞争力吗?》(2002)、《东亚创新:未来增长》(2003)、《全球变革与东亚政策倡议》(2004)。

展 :危机刚爆发(1997 年年中),他认为原因是糟糕的经济管理和过度腐败导致了危机国家货币的高估 ,即经济基本面的恶化导致了危机 ;1998 年 3 月 ,他提出 “ 真正把亚洲推向悬崖边缘的 ,是借贷(主要是国内借贷)中的道德风险 ”,并表示支持 IMF 打击造成风险的 “ 权贵资本主义 ” 的 “ 过度紧缩政策 ”; 1998 年 10 月 ,他推翻了自己在危机初期的看法 ,认为货币崩溃的原因是恐慌蔓延而不是经济基本面恶化 ,这次危机 “ 与其说它是经济问题 ,倒不如说它是一个市场恐慌的预言自我实现的例子 ”^[5]。这样 ,克鲁格曼最后实际上是用 “ 市场恐慌论 ” 取代了 “ 汗水论 ” 来解释危机的原因。

日本经济学家伊藤隆敏认为 ,危机的根源是进入 90 年代后东亚政府在资本和金融市场的设计和监管方面存在 “ 脆弱性 ”^[6]。这种脆弱性具体体现在 :①金融部门以所收取的短期存款或硬货币(美元、日元、欧元)满足国内长期资本需求 ,导致 “ 双重错配 ”^① 的困难(特别是在韩国和泰国) ;②政府对金融机构进行管理和监管的框架不够精密 ,造成了不良后果 ,比如 ,银行缺乏独立的贷款风险分析 ,银行结构不足以应付大量不良贷款积累所造成的坏账 ,政府缺乏审慎的风险管理政策 ;③自由化顺序^② 错误。东亚往往没有坚持正确的自由化顺序 ,降低了抵御风险的能力 ,如韩国对流入的外商直接投资进行了严格的控制 ,但却对本国银行从国外的借贷实行了自由化 ,最后因为韩国银行借了(或担保)巨额的外国短期资金无法偿还引发了韩国的金融危机 ;④东亚政府通常保持本币兑美元汇率的相对稳定 ,这有利于出口增长和吸引外商直接投资 ,但是 ,稳定的汇率也减少了短期资本借贷的汇率风险 ,从而会导致短期外债的积累。

世界银行专家斯蒂格利茨的分析焦点同样集中于金融部门 ,但他的分析角度不同。他认为 ,东亚政府在 20 世纪 90 年代之前的金融政策发挥了推动经济增长的积极作用 ,体现在 :①帮助创立大量银行 ,并鼓励它们进行开发性贷款(一般都是长期贷款) ;②通过金融限制政策(限制竞争、降低存款利率等) ,增加银行的盈利 ,以维持其贷款能力 ;③构建了一种独特的风险吸收机制。当出现宏观经济冲击时 ,银行对贷款进行延期 ,而政府则承担可能出现的风险。那么危机从何而来呢 ? 斯蒂格利茨指出 ,东亚金融危机的源头在于外部压力。进入 90 年代 ,由于国际

货币基金组织和美国财政部的压力 ,东亚 “ 不得不在合适的监管体制到位前 ,很快地推行资本市场自由化 ”^[6]。此外 ,危机的另外两个次要原因是 :快速自由化之后 ,东亚没有及时采取措施强化银行体系 ;在私营部门的高薪诱惑下 ,政府监管部门无法留住优秀人才 ,影响了有效的监管制度的形成。

美国历史学家、“发展型国家”理论的首倡者查默斯·约翰逊也持 “ 危机外来论 ”,但是 ,他认为始作俑者是日本。他分析道 ,90 年代日本国内经济开始出现投机泡沫 ,无限制的银行借贷逐渐增多 ,当无法避免的崩盘出现之时 ,日本不是采取改革银行业务 ,要求公司对不良投资决定负责 ,而是 “ 以邻为壑 ”,将泡沫转嫁给了韩国和东南亚 ,因此导致了危机的爆发^[7]。

二、东亚经济的 “ 反弹式复苏 ”

从 1997 年 7 月到 1998 年 10 月 ,金融危机大约持续了一年多。当时有人预测 ,东亚会像 80 年代拉美地区一样 ,严重的金融危机导致经济呈 “ U 型渐进式复苏 ”,90 年代可能会成为东亚 “ 失去的十年 ”。但是 ,事实并非如此 ,从表 1 可以看出 ,到 1999 年 ,东亚 6 个主要经济体都实现了经济复苏。2001 年 ,由于美国和欧洲的经济衰退波及东亚 ,东亚经济又陷入了危机(有人称之为 “ 危机的第二阶段 ”),但是到 2002 年 ,东亚就很快再次复苏。再以 5 个遭受危机冲击最严重的经济体为例 ,5 个 “ 危机国家 ”(印度尼西亚、韩国、马来西亚、菲律宾和泰国)1998 年经济平均下降了 7.8% ,1999 年平均增长则达到 5%^[8] ,经济复苏的速度还是比较快的。总之 ,东亚没有走拉美的老路 ,危机后的东亚经济走的是 V 型 “ 反弹式复苏 ” 道路。

表 1 危机后东亚主要经济体的经济增长率 %

东亚主要经济体	1998 年	1999 年	2000 年	2001 年	2002 年
日本	-2.8	1.4	2.8	-1.9	2.8
新加坡	0.4	5.4	10.5	-2.6	1.5
韩国	-6.7	10.7	4.6	3.7	6.8
中国	7.8	7.1	7.3	7.6	8.1
中国香港	-5.1	2.9	6.8	-1.6	5.0
中国台湾	4.6	5.4	4.1	-2.7	4.2

资料来源 :Cited from Cal Clark , Changhoon Jung. The resurrection of east asian dynamism : a call to look beyond the orthodoxies in development studies[J]. Asian Affairs 2004 ,31(3) :131-151.

这种现象引起了人们极大的兴趣 ,追寻东亚复苏的动力成为各界热议的话题。作为危机救援参与

① 长期资本需求最好是由长期投资者的资本以股票和长期债券的形式来满足。如果长期投资由银行等收取短期存款的部门提供 ,就会发生 “ 期限错配 ”,如果外资银行将海外资金贷给国内公司 ,就会出现 “ 币种错配 ”。

② 通常 ,贸易自由化应先于金融自由化 ,国内金融管制的实行应先于国际金融的自由化 ,直接投资的自由化应先于证券市场和银行贷款的自由化。

者的世界银行,在这场讨论中处于中心地位。1998年,世界银行出版了关于东亚复苏的研究报告《东亚的复苏之路》,探讨东亚复苏的可能路径,但是,由于这份报告出版时,东亚的经济衰退正进入最低潮,危机尚未结束,许多深层问题还在逐渐暴露,研究报告来不及全面评估整个危机的冲击力。2000年,世界银行出版了两份研究报告——《东亚奇迹的反思》和《东亚的复苏与超越》。这时东亚已经全面复苏,新报告的部分内容比较全面地研究了复苏的动力。与此同时,另一个更大型的研究计划也在进行。世界银行和日本政府1999年联合启动的“东亚发展前景”系列课题计划,经过两年多的研究,2002年出版了第一部研究成果——《东亚具有竞争力吗?——应对全球市场竞争的创新法则》,从创新的角度去发现东亚复苏的动力,并提出未来东亚实现创新增长的政策建议。

根据世界银行2000年和2002年3份报告的研究成果,并参考其他观点,笔者认为,推动东亚实现“反弹式复苏”的动力主要有以下4种:

1. 外部动力

国际货币基金组织、世界银行、亚洲开发银行和日本政府分批对危机国家进行援助贷款,以帮助这些国家重建信心,阻止汇率贬值,挽救经济局势。据统计,印度尼西亚得到了420亿美元贷款,占1997年GDP的20%;韩国得到了582亿美元,占GDP的13%;泰国得到了172亿美元,占GDP的12%^{[8] 31};1999年后半期,东亚区域内贸易的增加以及日元升值,加快了复苏的步伐。中国坚持人民币不贬值的政策,有助于东亚经济秩序的稳定,为东亚经济复苏提供了较为有利的环境。上述这些外部因素构成了东亚“反弹式复苏”的外部推动力。

2. 技术动力

在几十年的高速增长中,东亚许多公司成功吸收了国际技术,培育了自己的技术优势。90年代末,互联网的扩张(东亚地区的网络用户从1998年的1300万增加到1999年的2200万),科技股的上扬,引发了东亚整个地区股票市场的复苏^[9],为经济复苏提供了强劲的动力。同时,东亚的人均拥有计算机量很高,在诸如互联网接入、人均电话线路以及无线设备利用等指标上均好于其他发展中地区^[10]。技术优势内涵的创新潜力培育了东亚企业应对危机的能力,是东亚能够较快复苏的内部推动力。

3. 实体经济动力

实体经济表现为经济增长率、失业率、储蓄率和投资。东亚30年经济高速增长所造就的产业竞争力、强劲的出口、外商直接投资、高储蓄和高投资等优点,都将推动亚洲经济重回早期的增长轨道^[6]。东亚实体经济表现良好,意味着经济基本面比较好,这是东亚较快复苏的牵引力。

4. 政策动力

东亚各国在满足投资需求^①方面的不同政策,决定了经济复苏的速度和代价:泰国、韩国、印度尼西亚和菲律宾在危机前获得了大量的组合证券资本,银行负担了巨额的短期外债,受危机的冲击最大,导致复苏速度比较慢或者复苏代价很大;中国、新加坡和马来西亚则充分利用了外商直接投资,在危机中的损失相对比较小,复苏速度也比较快。此外,在危机爆发后,东亚各国政府对待外援的政策也不同:马来西亚拒绝IMF的援助方案,主要靠自己渡过难关,韩国则接受了IMF的援助。不过,虽然政策不同,两国的恢复速度都很快。可以说,战后东亚长期发展中形成的政策能力是较快复苏的内在驱动力。

三、追寻复苏背后的活力因素

要追寻东亚“反弹式复苏”背后的活力,必须从两个方面入手:追究危机的真正原因,以清除纵向地追寻复苏活力的认识障碍;理性评估各种复苏动力,以能够客观地对复苏活力进行横向追寻。

首先,必须弄清造成危机的真正原因。综合上文介绍的关于危机成因的3种解释,可以发现危机的真正原因。克鲁格曼的“汗水论”睿智地发现了东亚内部潜伏的深层问题,提醒东亚要注意提高技术能力,提高劳动生产率,否则将“行之不远”,早晚会出现危机。但是,东亚经济增长主要靠“汗水变量”的缺陷是否就严重到了在1997年引发危机呢?经过对危机发展全过程的观察,克鲁格曼认为,真正引发危机的应该是“(对货币崩溃的)恐慌蔓延而不是经济基本面恶化”。在金融学理论中,恐慌并不一定是对过失的惩罚,对投资者来说,一个经济体即使基本面良好,一句谣言就可以让它面临毁灭性的资金外逃。因此,克鲁格曼虽然根据“汗水论”成功预测了东亚经济将会遭遇危机,但他最后并没有将“汗水变量”列为引发危机的原因。伊藤隆敏的“脆弱论”指出,进入90年代后,政府金融监管机制显现出脆弱性,东亚原来构建的“有效和安全的金融体制”已经

① 东亚虽然普遍拥有较高的储蓄率,但是,当投资需求超过国内储蓄时,还是需要大量的海外资金。外商直接投资(FDI)和组合证券资本(包括股票、债券和银行贷款)是海外融资的两种重要手段。FDI周期长,风险小,但对国内制度环境要求较高;组合证券资本多为短期,周期短,风险大,但获得较容易。

无法抵御金融风险,斯蒂格利茨和约翰逊的“危机外来论”追究了IMF、美国和日本对造成危机应负的责任。斯蒂格利茨进一步指出,东亚原来有一个行之有效的金融风险吸收体制,但是进入90年代后,形势的变化使东亚政府面临严峻的金融困境:在合适的金融监管体制建立之前(东亚本来是有能力做到的),被迫很快地推行资本市场自由化。

通过以上分析,笔者认为:创造了“东亚奇迹”的地理因素、政策因素、技术因素和文化因素都不是造成危机的原因^①,这场危机直接起因于金融恐慌和90年代东亚金融监管机制的脆弱。因此,东亚30年(60年代~90年代)经济发展所积累的经验都是复苏活力的来源。

其次,必须谨慎评估某些存在争议的复苏动力。经济学家们对危机后东亚经济复苏的技术动力存在较大的争议,从克鲁格曼的技术贡献“忽略不计论”到世界银行的技术对经济增长“1/3贡献论”,各方争论纷纷。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的迈克尔·萨雷尔对此做了更为细致的研究。他指出,新加坡、马来西亚和泰国在1978年至1996年期间的年均TFP增长率^②为2%~2.5%,而同期美国TFP增长率仅为0.3%。萨雷尔还指出,由于许多技术改造与生产流程的优化重组包含在从发达工业化国家进口机器设备这一投资行为之中,效用剥离的难度很大,因此,“被克鲁格曼当做资源投入增加的结果而从GDP增长总量中扣除的部分中,有许多实际上应归入TFP增长的范畴”^③。美国经济学教授霍华德·帕克则进一步指出,萨雷尔和克鲁格曼等人从宏观角度度量到的较低的或接近于零的TFP增长率,与微观层面上的数据相矛盾。从微观角度看,东亚的公司具有技术优势,许多公司成功地吸收了国际技术。因此,东亚的经济增长有很大一部分来源于生产的优化^④。也就是说,东亚的经济增长有很大一部分来源于TFP的贡献。笔者的看法是,由于量度TFP的困难,东亚公司技术进步的事实应该可以说明技术对东亚经济增长的贡献不可忽视。对实体经济的推动作用和政策的驱动作用是比较没有争议的,前者是创造“东亚奇迹”四因素聚合力的体现,后者则反映了东亚不同经济体处理复杂的金融问题时所表现出的不同程度的“务实和灵活”。

综上所述,外部动力、技术动力、实体经济动力和政策动力这4种动力共同构成了独特的“东亚活力”,推动东亚经济实现了“反弹式复苏”。不过,由于各种动力聚合方式各有不同^⑤,东亚不同经济体的活力成分也有所不同:新加坡活力主要来自高效廉洁的政府,中国香港地区的活力主要来自高度自由开放的市场体制,中国台湾地区的活力主要来自中小企业,日本和韩国的活力主要来自强大的发展取向的政府,印度尼西亚、马来西亚和泰国的活力则主要来自出口部门。

进入21世纪,面临全球化和区域化的新形势,“东亚活力”必须培育新的发展能量(比如,在法治、民主和区域一体化等方面进行创新性的变革),以有效克服在发展进程中形影相随的“市场失灵”和“政府失灵”问题,缩短与发达地区的发展差距。

参考文献:

- [1] 印德米特·吉米.东亚复兴:关于经济增长的观点[M].黄志强,译.北京:中信出版社,2008:50.
- [2] 张静中.克服东南亚金融危机的影响保持经济增长[J].河海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1999,(1):51-56.
- [3] 赵联宁.“蝴蝶效应”与东南亚金融危机[J].河海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00,(1):66-68.
- [4] KRUGMAN P. The myth of Asia's miracle[J]. Foreign Affairs, 1994, 73(6): 62-78.
- [5] 胡永泰.克鲁格曼的智力冒险:勇于认错是优秀经济学家的标志[N].南方周末,2008-10-16(16).
- [6] 伊藤隆敏.东亚的增长、危机和经济复苏、前景[M]//世界银行、东亚的复苏与超越.朱文晖,译.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1:41-67.
- [7] 查默斯·约翰逊.发展型国家:概念的探索[M]//禹贞恩.发展型国家.曹海军,译.长春:吉林出版集团有限责任公司,2008:8-72.
- [8] 世界银行.东亚的复苏与超越[M].朱文晖,译.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1.
- [9] The fear of the internet[J]. Far Eastern Economic Review, 2000, 163(1): 20-23.
- [10] 沙希德·尤素福.东亚具有竞争力吗?——应对全球市场竞争的创新法则[M].王丹莹,译.北京:中国财政经济出版社,2004:146.
- [11] 菲利普·科特勒.重塑亚洲:从泡沫经济到可持续经济[M].段盛华,王寅,译.上海:上海远东出版社,2001:25.

① 具体论述参见:世界银行工作人员.东亚奇迹:经济增长与公共政策:中文版[M].北京:中国财政经济出版社,1994:1-16;Tu Wei-ming. A confucian perspective on the rise of industrial East Asia[J]. Bulletin of the American Academy of Arts and Sciences, 1988, 43(1): 32-50.

② 全要素生产率,指除劳动、资本要素之外的各种促进经济增长要素的组合,技术在这种组合中起核心作用。

③ 比如,印度尼西亚、马来西亚和泰国“有选择工业化政策”基本上都失败了,但在缩小国内收入差距、减少贫困人群方面却颇为成功(特别是马来西亚“马来人优先”政策成效尤其显著);东盟三国在资本、劳动力素质和技术能力方面比不上“四小”,但是由于三国的资源禀赋基础比较好(印度尼西亚的木材、泰国的大米和马来西亚的橡胶),出口部门的增长同样非常迅速。